

An impressionistic painting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in Beijing, featuring the Hall of Prayer for Good Harvests and the Echo Wall.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rich color palette of blues, purples, and oranges.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
解读中国尚贤制的权威之作

贤能政治

为什么尚贤制比
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加] 贝淡宁◎著
吴万伟◎译 宋冰◎审校

Daniel A. Bell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贤能政治

为什么尚贤制
比选举民主制
更适合中国

[加] 贝淡宁 (Daniel A. Bell) ◎ 著

吴万伟◎译 宋冰◎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贤能政治/(加)贝淡宁著;吴万伟,宋冰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9
书名原文:The China Model
ISBN 978-7-5086-6485-9

I. ①贤… II. ①贝… ②吴… ③宋…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D616 ②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7397号

The China Model by Daniel A. Bell

Copyright © 2015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贤能政治

著者:[加]贝淡宁

译者:吴万伟

审校:宋冰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8.75 字数:345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6-263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6485-9

定价:6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受天下之善；

平其心，论天下之事；

潜其心，观天下之理；

定其心，应天下之变。



| 谨以此书献给我尊敬的岳父宋孝伦及岳母薛蕴菁 |

中国是否创立了真正新颖的治理模式？这个模式运行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贝淡宁对中国模式的评估在许多读者看来是积极的、乐观的，评价之高令人吃惊。不过，论证过程谨慎扎实，值得任何一位研究当今中国的读者认真阅读和思考。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中国空降兵》的作者

对许多西方读者来说，贝淡宁的书很难让人消化，因为它质疑“根本真理”。对中国读者来说，贝淡宁的书使其相信至少有些西方人理解他们。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其考试制度，因为它既能选拔贤能又比较客观。这种对个人成就的关注总是与为共同体服务的道德义务结合起来。《贤能政治》解释了这种双重性如何在当代中国继续运行。

杨荣文
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部长

在西方国家，连对一人一票原则的质疑都可能招来诅咒，但贝淡宁恰恰这样做了。他根据儒家的精神，强烈支持贤能政治，认为民主选举不能解决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本极具挑衅性的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马蒂亚斯·里斯（Mattias Risse）
哈佛大学教授

很少有像这本书这样分析如此透彻、话题如此及时、思考与当今现实如此相关的著作。贝淡宁将其在西方接受的学术智慧训练和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经验结合起来，解释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尚贤制的发展。任何一位对中国感兴趣和关心西方民主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一下这本让人大开眼界的著作。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贤能政治》一书非常及时，独创性强而且十分重要。基于作者对当今政治理论的精炼把握和对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的多种特征的深刻认识，这本书将成为学习政治的学生、汉学家和所有对中国崛起感兴趣的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

尤锐 (Yuri Pines)
《永远的帝国》的作者

贝淡宁用通俗流畅的文笔提出了一个挑战传统思想的问题——民主还是尚贤。他利用其在当代中国的教学和生活经验带领读者回顾和思考政治哲学中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我发现贝淡宁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吉迪恩·拉赫曼 (Gideon Rachman)
《金融时报》

贝淡宁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思想开放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对中国政治有充满智慧的了解，同样宝贵的是它会迫使读者反思自己对民主的忠诚。《贤能政治》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写的。它让我重新思考西方治理体系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让人获益良多。

克莱夫·克鲁克 (Clive Crook)
彭博新闻社

贝淡宁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非常有意义地论述了，为什么外部世界应该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实践。这本书的文笔清晰、流畅、可读性强。

克里·布朗 (Kerry Brown)
《亚洲书评》

中文版
序言

本书是我过去 12 年来在北京生活和在清华教书的亲身经历的直接产物。我讲授政治理论。我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往往就政治领袖的哪些品质最重要以及如何挑选拥有这些品质的领袖等问题进行辩论。其他辩论话题还包括如何限制依靠尚贤标准选拔出来的领袖的权力，以及如何将民主与贤能政治结合起来。这些问题是中国政治辩论的核心，本书只是尝试用系统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而已。当然，我的解释非常有限，我很清楚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论反思和实证研究。同时我认为更加开放的政治环境有助于对此类问题的自由探索。但是，至少我们能够在中国讨论这些问题而无须不断论证讨论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而在西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自从英文版于 2015 年夏天出版以来，本书就在英语国家不断引起争论的风暴。虽然我有意克制自己不去参与论战，而且本书近 1/3 的篇幅都是对内容的注解，但它似乎仍然触发了某些不加掩饰的政治情绪。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有如此多的反对呢？原因之一是西方对民主观念的教条式依恋，认为它是唯一可辩护的国家管理形式（这

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更确切地说，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时唯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方式。任何其他方法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教条式的成见，即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如西方的好：它在本质上类似于苏联那样的“坏”共产党政权，这样的政权越早垮台越好。我认为，相比之下，大部分中国读者在思想上更加开放。言归正传，在本序言中，除了针对中国的新近政治发展更新我的一些观点外，我觉得就主要的批评意见做出回应也非常重要。

民主是坏东西吗？

本书被认为是对民主的攻击。比如牛津大学的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教授就宣称本书的目的是“说服我们这些民主的辩护者，让我们觉得自己错了”。^①他认为我试图“贬低民主，这本书也不会受到欢迎”，“贝淡宁是中国体制的崇拜者，在他看来，仅仅朋友成功还不够，仇敌人还必须失败”。

但是，我并没有要贬低民主的意图。正好相反：我强烈支持实施选举民主的国家进行民主选举。我希望民主能够依靠吸取尚贤制的优点而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需要以选举民主为基础，即便仅仅因为现实中的其他选择可能是军事独裁或专制民粹主义。一旦人民开始投票，他们就不愿意放弃这种权利了，支持其他政治选择的人就只能依靠武力改变制度。而民主的那些替代性选择几乎毫无例外地比选举民主更糟糕：想想泰国或埃及（当埃及军事独裁者在少数有钱的“自由派”支持下推翻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所以，当国家推行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的制度后，

^① 参见<https://www.opendemocracy.net/stein-ringen/is-chinese-autocracy-outperforming-western-democracy>。本节引用了我的回应：<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aniel-bell/democracy-dying-days>。

再要改变就已经来不及了（除非通过武力），虽然有相反的案例。不过，选举民主能够，而且也应该学习与其相容的尚贤实践，如建立高效、专业的公务员体系，在特定具体领域赋予专家决策权等。

那么，我为什么以讨论民主制的四大典型问题作为第一章的开头呢？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将一人一票理想“去神圣化”，目的就是想显示，若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政治尚贤制表现更好。我希望读者能够参与到我在本书其他部分探索的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更平衡的评价之中。我现在认识到，让西方人抛弃他们视为几乎具有神圣宗教色彩的政治价值观并不容易。我本人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中长大，经历了几十年的对自己道德体系的冲击，才开始质疑从小就形成的民主等自认为普适的价值观。假设西方人读了本书的第一章后就质疑那些承诺或许不太现实。我现在认识到，第一章这样处理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后果，不是让人们思想更开放，反而促使人们把思想封闭起来。

但是，那种认为民主适合某些国家但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难道不是有严重问题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让人联想起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反对在印度等“野蛮”国家实行民主的那种“东方主义”吗？果真如此，我们也同样可以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宣称中国人素质太低，根本不适合选举民主的观点。不过，我的论证以牢靠的实证性证据为支撑。我认为像美国这种国家的选民素质也非常低^①，我们没有理由期待中国选民比世界其他地方的选民更理性或更具公众服务精神。既然中国逐步形成和实施了一套尚贤制来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道德素质的政治领袖——尽

^① 新发表的实证性研究著作增加了令人担忧的消息，请参阅：Christopher H. Aden and Larry M.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更加乐观的看法，请参阅：Gerry Mackie, “Rational Ignorance and Beyond,” in *Collective Wisdom: Principles and Mechanisms*, ed. Helene Landemore and Jon El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管不算完美，任何的改进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提出改进尚贤制并将其缺陷最小化的建议难道不重要吗？在中国，尚贤理想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成为过去 30 年政治改革的灵感之源。可靠的政治民意调查持续证明这种改革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过去一年，我就本书做过多场演讲。常常有人问我：“如果选举民主能够在中国台湾行得通，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就行不通呢？”我的回答是政治背景完全不同。一方面，中国台湾是相对繁荣和发达的社会，其问题（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千百万人处于极端贫困）若与大陆相比相对不那么严峻。即便台湾政治陷入瘫痪恶斗^①，那也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这样的后果对大陆来说将是一场灾难，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末日。国家的规模大小是举足轻重的考量。即使付出忽略长远计划或罔顾子孙后代或者世界上其他人利益的代价，小的政治实体也能承受起民粹主义和狭隘的自我沉溺。但中国是政治大国，其政策影响着现在和未来数亿中国人的生活以及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中国大陆绝对承受不起中国台湾式的选举民主的不良后果。

虽然如此，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中国台湾和其他政治共同体有很多值得中国大陆学习的地方。台湾进行了平权行动，大幅增加了从政女性的比例^②，这为大陆男性领袖占支配地位的政治环境提供了明显的借鉴经验。改善贤能政治的努力与不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会的其他特征之间并没有格格不入之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当然这种结社自由无权组建政党去竞选高层领导职位）、法治和各种各样的民主革新如进行全民公投和协商式投

① 请参阅：Chu Yun-Han, *Gao si zai yun: Yi ge zhishifenzi dui 21 shiji de sikao* (*Thinking in the Clouds: Contemplation of an Intellectual in the 21st Century*) (Taipei: Commonwealth, 2015). 朱云汉认为很多政治资源被浪费在没完没了的丑陋的恶斗中，结果造成政府瘫痪。经济恶化，很少能干和正直的人愿意从政。

② 请参阅：<http://www.icpublicpolicy.org/conference/file/reponse/1433867293.pdf>.

票等。我们看到，在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需要对这些民主价值观和实践持开放态度。

为现状辩护？

有朋友告诉我，本书已经跻身于人们还没有读过就可以夸夸其谈的书籍之列，我应该深感荣幸才是。对此，我不敢苟同：如果人们形成了误解，再去消除这种误解往往非常困难。^① 对我最常见的指控是充当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但是，任何一位切实读过本书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是在捍卫一种理想，而非当下的政治现实。

我是研究政治理论的，我采用的方法是“情境政治理论研究”：即对主导一个社会公众文化的政治观点做出连贯、合理和可辩护的描述。因为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 12 年，这个方法自然被应用在当今中国的主要政治辩论中。如果我一直生活在西方国家，就不可能或不愿意写这样一本书了，西方学者和政治改革者心照不宣地认为选举民主是挑选政治领袖的唯一合理方式，其他任何选择都可以归入“坏”专制阵营。

中国的政府官员、改革者、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都认同的理想状态可以被称为“垂直的民主尚贤制”，意思是基层实行民主，越往政府高层走，尚贤的成分就越大。在经受了“文革”期间的激进民粹主义和专制独裁的灾难性体验之后，这个国家渴望德才兼备的人担任领导职位。在没有多大争议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了传统的选贤任能中的某些原则，比

^① 我现在意识到本书英文版的书名或许应该为此负责：因为“中国模式”这个词常常被用来指中国的政治现实而非理想，人们很容易从书名中得出结论说我是在为现状辩护。这让我想起与我同名的学者丹尼尔·贝尔，他曾经哀叹于这个事实，即人们仅仅因为他的书名而认为他预言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事实上，他只是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美国的终结而已）。

如基于考试和在低一级政府的政绩表现来选拔干部。这种垂直式民主尚贤制观念在过去 30 年推动了政治改革，但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本书对政治现实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绝非为政治现状辩护。不过，我主张的改变是扎根于中国人广泛赞同的理想而非那些无法与中国历史、近年的政治改革以及现在众多人的想法形成广泛共鸣的舶来品。^①

在西方社会生活和工作的理论家广泛使用情境政治理论来解释得到广泛认同的民主理想，随后再用它来批判性地评价政治现实。这个方法很少被用在非民主社会（此处是指那些甚至表面上都不主张民主选举形式的社会）。事实上，我想不出有哪位当代政治理论家试图著书来论证一番。

当然，理论家不愿意为非民主政治体制辩护的主要原因是 20 世纪民主的其他替代性选择——纳粹和苏联共产主义，给数亿人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苦难。西方有些知识分子的确尝试为那些政治制度辩护，但是他们的努力理所应当地都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公平地说，那些理论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试图捍卫的政治制度，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构建与制度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有些评论者声称，我的书就属此类，这种政治思维即便不是不道德的，至少也是被引入歧途的。那些思想家基本上被排除在他们所写的社会之外：他们把理想投射到模糊和神秘的社会之中。如果说他们有罪过的话，那就是他们应该更谨慎一些，应该意识到要在封闭的社会中获得可靠的信息是极其困难的。

当今中国是个与众不同的“政治动物”：规模庞大、结构复杂，政治体制不甚透明。但是，若想获得充分的信息以便对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做

① 这并非暗示只能使用中国的标准评价社会的进步或者退步。比如，最基本的人权概念——包括有权免于被谋杀、被虐待、被奴役、被屠杀以及刑事案件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或许都源自西方社会，并在那里被系统化地发展和制度化，但是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形成共鸣，如今被中国人广泛接受。这些理想能够，而且也应该被用来评价中国的进步或者退步。

出知情的判断则完全有可能。任何一个人，只要能说汉语，在这个国家和海外旅行过，能与各界人士和群体交流（包括各级政府的政治领袖），能广泛阅读中英文著作，登录网站并参与各色政治观点讨论，他都能对社会的主要政治观点做出比较靠谱的解释。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但是，若把我比作根本不了解情况却为暴君统治下屠杀千百万人的封闭政治制度辩护的早期思想家，未免有些不够厚道。

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用何种理想制度来评价政治现实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性选择。批评我的人认为，应该将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评价中国政治进步或者退步的标准，他们对基于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提出政治理想的观点毫无兴趣。这里，他们不过是步了穆勒、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等西方思想家的后尘而已。并非巧合的是，这些观点在西方殖民主义鼎盛时期是最常见的。

如今的中国不再是殖民地国家，而是越来越强大、自豪感越来越浓烈的国家。他们有着丰富和多样的政治传统，政治领袖、改革者、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渴望从传统中吸取灵感。^① 自然，那些按照与中国传统没有任何关系的理想评价中国政治现实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国也遭到排斥。中国思想家若严格按照儒家理想来评价西方国家的现行民主，肯定遭到西方人的排斥。无论西方民主派的意图多么纯洁，如果他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不努力理解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理想的话，

^① 如果与仅仅以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更多承诺为标准衡量进步与否自诩的自由派相比的话，传统的复兴是我对中国最近的发展更加乐观的原因之一。虽然我同意自由派的观点——最近管控力度加大是令人感到悲观的理由之一，但是无论私下聚会还是公共话语中儒家和中国其他传统的复兴都有理由让人感到乐观。请参阅：Anna Sun, *Confucianism as a World Religion: Contested Histories an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Kenneth J. Hammond and Jeffrey L. Richey, eds., *The Sage Returns: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Albany: SUNY Press, 2015); and Sebastien Billioud and Joel Thoravel, *The Sage and the People: 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就很容易极度伤害与中国的关系。当然，这些都是说时容易做时难。不过，若要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乌托邦宣言？

其他批评来自相反的方向：问题不是我过于贴近中国的政治现实，而是我有些过于超然。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发表了三篇书评，指责本书是“虚构的小说”。虽然我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12年，参与了与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官员的对话，并且在一所培养了众多中国高层领袖的大学教书，但我写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本“并非描述真实中国”的书。^①问题不在于我对基层选举民主或中层政策实验的描述——很难否认这些现实，而在于我为高层的尚贤理想辩护。在理论上，若与通过定期竞争性选举领导人的民主体制相比，依靠考试和低层政绩以尚贤方式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或许还有优势：只有那些在低层政府表现卓越的人才能一步步走上最高领导岗位，经过尚贤方式选拔的领袖不大可能犯下初学者的错误。他们能够制订考虑子孙后代利益的长远规划而无须担忧下次选举的结果；他们能够安心在基层进行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改革实验以看到胜利的果实，因为他们知道高层是稳定的；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合理的政策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筹款和一次次发表同样的竞选演说上。

但是，批评家说，尚贤理想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②这种愤世嫉俗源自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共产党首先和最重要的

^① See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eijing-bull-the-bogus-china-model-14107>. 内森还在《中国档案》(Chinafile)发表全文版，在《政治学视角》(Perspectives on Politics)发表减缩版。本节引自我的回应：<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facts-values-chinas-political-system-14364>.

^② 请参阅：John Fitzgerald, “The Q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Qing!” Inside Story, 11 Aug. 2015 (<http://insidestory.org.au/the-qing-is-dead-long-live-the-qing>).

目的是执掌政权。但是，如果说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本质上与其他专制体制是一丘之貉，那就是忽略了中国政治故事中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大可能进行导致其毁灭的政治改革，但它已经决定建立（重建）不同于其他非民主国家的贤能政治的事实，恰恰是过去 30 多年成功的关键。

我们如何辨别贤能政治是否存在呢？应该承认，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贤能政治的目的是选拔有高超才能和品质的领袖，但是，美德究竟是什么却因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见本书第二章）。我的关注点集中在一个渴望建成贤能政治、现代化以及相对和平的大国里市级以上政府官员的政治品德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然后把研究发现用来评价中国的现实。我认为政治体制应该旨在挑选和提拔拥有高超智识、社交技能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并提出了更加可能选拔出拥有这些品质的领导人的制度建议。当然，我承认政治尚贤制的实施非常困难。在贫穷和混乱的社会（如伊拉克和阿富汗）都能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无论好坏），与之相比，要建立起能够选拔拥有高素质领导人的公平和可靠的制度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那么，若说中国在过去 30 年取得了贤能政治方面的进步，我们的依据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当然存在很大的鸿沟。^①上级的提携与栽培以及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在解释谁能被提拔上去时会发挥一定的作用。确定官员任命和提拔标准的组织部的工作与前些年相比有了更多的开放性，但对外行人来说仍然是雾里看花，让人捉摸不透。

但是，我们很难否认，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确有了更多尚贤色彩。教育和考试在政治领导人的选拔任命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书提出的实证性证据表明，官员往往是因为在下级政府中的政绩突出而被提

^① 对美国的民主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不同意批评家得出的美国民主是“虚构的小说”这一结论。只要民主理想仍然被广泛赞同，部分体现在制度中，能够作为评价是否取得进步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说美国是民主国家（即便非常不完美）。

拔，而良好的政绩通常依靠的是经济增长。^① 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功在选拔政府官员方面发挥了作用。没有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业绩就能够升职的官员即便有，也很少。但是，政治庇护关系网在高层政府还是比较重要。从积极方面说，中国大部分高层领导人都有非常卓越的（与选举民主的领袖相比）经济理解和管理能力，而社交技能在晋升至政府高层所需要的更深刻和更丰富社交关系网方面有特别的帮助作用，这些关系网也非常有助于政策的实施。

有些批评家质疑中国数亿人脱贫是得益于中国领导人的作为，他们认为我们应该称赞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而不是政府。但是，人民是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做事的。中国现存政治尚贤制与国家的脱贫奇迹之间存在这样的联系：官员的提拔常常是根据其在中低层政府的政绩，而政绩往往是根据经济增长来衡量的，因为经济增长是脱贫的关键，官员提拔的激励机制在脱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土地改革和“中央认可的地方实验”也是由（至少部分依据）其经济业绩而被提拔上来的官员负责实施的。

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的确不是解释谁能被提拔的唯一因素，即使它对官员的职业前景具有可测量的影响。林根教授确认“低层官员通过考核被提拔的最重要标准是其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表现”。维稳的重要性是从反相关的方面去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辖区动荡不稳，这个辖区的官员得到提拔的可能性就很小。这种相关性同样适用于“对党的忠诚”：若党的官员

^① 更多最新证据，请参阅：Yao Yang and Zhang Muyang, “Subnational Lead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 (2015): 405–436. 于2015年10月19日在杜克大学举办的有关本书的研讨会上，埃德蒙德·马利斯基（Edmund Malesky）提供了证据证明推广标准可能在推广之前造成被扭曲的政治角力循环期。也可参阅：何包钢对拙著的书评，里面有实证研究的支持。See also He Baogang’s empirically informed critical review of my book, in *Perspectives in Politics* 14, no. 1 (Mar. 2016).